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
教学的新局面(笔谈)

曹禺戏剧与契诃夫 朱栋霖

论孙犁作品的艺术风格 郭志刚

一九八二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

张建勇 刘福春 辛 宇

1983 3

北京出版社

封面题字：萧 劳
封面设计：刘玉忠

375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八三年 第三辑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合编
北京出版社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280,000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700

书号：10071·476 定价：1.10元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目录

一九八三年第三辑 (总第十六辑)

笔 谈

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

编者的话	(1)
三点想法	王景山 (2)
克服“偏枯”现象	吴奔星 (5)
关于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设想	陈学超 (10)
现代文学教学也要百花齐放	黄修己 (17)
改进教学漫谈	杨占升 (18)
“清汤寡水论”	蒙树宏 (22)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一点刍议	王锦泉 (26)

比 较 研 究

曹禺戏剧与契诃夫	朱栋霖 (30)
《子夜》与《金钱》比较论	张明亮 (54)
《原野》和表现主义	潘克明 (76)
艾青与象征主义	陈 眇 文 楚 (244)

书 评

评《雷雨》人物谈	孙庆升 (93)
在读者面前再塑作家的形象 ——读《论沙汀的现实主义创作》	吴福辉 (104)
读《闻一多朱自清论》	高国平 (110)

作家作品研究

论孙犁作品的艺术风格	郭志刚	(114)
论茅盾前期的新小说观	朱德发	(142)
试论老舍的幽默	黄循洛	(172)
评闻一多的文艺观	杨景祥 李培澄	(185)
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 ——读张爱玲小说集《传奇》	赵园	(206)
评朱湘的诗	谢昭新	(221)
漫谈郭沫若的夜歌	徐明旭	(237)

资料

一九八二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		
.....	张建勇 刘福春 辛宇	(264)
鲁迅与朱安	段国超	(288)
关于“新月派”的形成和发展	王强	(310)
戴望舒资料三题	[香港大学] 杨玉峰	(326)
关于“问题小说”及其他	范伯群 陈巍	(335)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

福音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 ——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的发展		
.....[日本]斋藤敏康著 刘平译 程广林校		(339)

作家传记

坎坷路上的战士 ——记作家骆宾基	马尚瑞	(361)
---------------------	-----	-------

读者者编者

编后记	(374)
稿约	(封三)

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

编者的话

近几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家一方面肯定已经取得的成绩，一方面感到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渴望能有更多的改进和更快的提高。在一些会议上，在一些文章中，经常有人作着这方面的探讨。为了集思广益，充分交流意见，和引起更广泛的重视，本刊从这一辑起，开辟专栏，笔谈“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欢迎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同志、中国现代文学的爱好者，撰文参加这场讨论。

文章可以从总结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入手，也可以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包括长期悬而未决的老问题和这几年出现的新问题）发言，还可以从一门独立的、成熟的学科应有的格局、体系、积累和水平等设想；希望多结合实际的事例，更希望进一步作出理论的阐释；既要立足于当前，又要着意于长远的规划——从不同的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意见和建议可以就整个学科而言，也可以对某个方面而发；可以是短期（比如二三年、三五年）内就能够完成的任务，也可以是需要长期（比如十年、二十年）努力才能逐步实现的设想——重

要的是根据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原则，摆脱陈旧的框框和模式，开阔视野，活跃思路，大胆探索开创新局面的途径和措施。

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既有联系又有分工，既有共同之处也各有特点和侧重的方面。做好了，可以相互促进；做得不好，也会彼此牵制。为了推动整个学科的迅速发展，对于研究和教学理应一并考虑，同样重视。过去本刊对于教学工作注意不够，是个缺点。这次将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一起讨论，作为改进编辑工作、丰富刊物内容的一个措施，希望得到教学工作者的大力支持。

文章可长可短，或者全面探讨，系统论述；或者只涉及一个方面，提出一点意见。为了在有限的篇幅里能够尽量多刊登一些稿件，尤其欢迎集中谈一两个问题，字数在两三千字左右的短文。

在讨论中，请各抒己见，欢迎不同意见之间展开争鸣（这一辑的几篇文章中，就有不同的意见）。相互歧异的看法，有的通过讨论，可以相互沟通，接近，直至统一起来，有的不一定强求一致，或者在讨论结束时作出孰是孰非的结论。只要能够相互启发、相互补充，通过辩论又能促进双方作更深入的思考，就都有助于这场讨论和今后的工作。至于其中的是非正误，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的实践，开创整个学科新局面的实践，将会作出权威的选择和裁定。

三 点 想 法

王 景 山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和中国现代文学课的教学工作，这三者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

研究工作是基础，后二者都应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但后二者却又各有其特殊之处，不能和研究工作完全等同起来。

建国以来，这三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近几年更有了迅猛的发展。这是十分可喜的。不过，尽管如此，也仍然存在如何开创新局面的问题。我不揣浅陋，谨提出几点想法向同行们请教。

首先，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问题。过去深受某些政治运动的干扰，现在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过去片面强调文艺斗争，现在注意作家作品；过去大讲“革命”文艺，小讲“进步”文艺，不讲其他文艺，多讲解放区文艺，少讲国统区文艺，不讲沦陷区文艺，现在这种情况已开始有所转变。这自然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我觉得这还远远不够。研究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亟待填坑补缺之处，还所在多有。即以《中国新文学大系》所收作家作品而论，我们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的恐怕就决不只三位五位。

特别是在进行专人、专书、专事研究的基础上，应该大力强调综合的、比较的研究。例如，都说五四新文学，新文学运动，这个“新”到底新在何处，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个新文学为什么在这时出现，产生新文学的主客观因素都是哪些……这些问题都不是单单研究现代文学，就现代文学谈现代文学所能解决的，需要对“五四”时期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主题、题材、人物、写法等等，作综合性的研究。同时还要和清末民初的文坛作对比，和我国的传统的文学作对比，和欧美的、日本的文学作对比，从中看批判，看否定，看借鉴，看融化，看继承，看创新。甚至还应研究清末、民初的文化史、社会史以至政治史，从而看文学和社会、政治发展变动的关系。这样，庶几才能较准确地介绍五四新文学运动，较精当地评价五四新文学作家。

要做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就必须进行综合的、比较的研究。不综合，无以见全貌；不比较，无以见特点。

其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建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已经出版了不少，成绩不可低估。但总起来看，除因历次政治运动影响了内容的繁简、取舍，评价的高低、臧否外，仍难免有大同小异之感。

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是应该允许，也应该提倡百花齐放的。须知，购阅文学史的读者，情况不尽一样，要求自也不尽一样。有一般的文学爱好者，有专门的研究者，也有大学的文科学生，而大学又有综合大学、师范院校之分。希望用一种类型的文学史来适应并满足不同类型的读者的需要，是不切实际的。

因此，应当鼓励不同类型、不同体系、不同角度、不同重点的文学史出现。可以是通史，也可以是专史，可以是断代史，也可以是地区史，应有材料完备的长编，也应有简明扼要的简编。

我特别认为，编写一本真正适合当前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课教学用的讲义，更是当务之急。现在出的某些文学史，我总觉得有些高不成，低不就。作为研究者的参考，颇有缺漏，作为学生的讲义，却又嫌过于繁复了。

最后，关于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问题。我认为这方面的问题颇多，但迄今仍未引起真正的注意。

现在高校现代文学教学，基本上还是注入式，教师宣读讲稿，学生死记笔记，双方都陷于被动，无法生动活泼。这种情况，迟早必须改变。欲求根本改变，最重要的是向学生提供一套必备而又适用的教材，这套教材包括若干本必读作品、资料选，一本繁简适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一份指导学生学习的大纲和说明，一份供学生进一步阅读的参考书目。与此同时，要求学生把阅读原作品、原材料放在首要地位，结合阅读讲义，互相参证。在这样的认真自学的基础上，再听取教师的课堂讲授。如此，教学双方都可从讲义搬家（教师滔滔不绝，学生手不停挥）的

紧张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教师不必事无巨细，照本宣科，绍介面的知识可以提纲挈领，重点分析部分不妨画龙点睛。课堂上应该有释疑，有辩难，有讨论。教师的责任不再仅仅是传授现成的结论，而是启发、诱导学生举一以反三，触类而旁通。教师可以讲出自己的风格、特点，学生也有了思考、回味的余地。

总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要注意综合的比较，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应提倡百花齐放，现代文学教学必改注入式为启发式，如此而已！

(一九八三、二、廿二)

克服“偏枯”现象

吴奔星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高等院校文科都开设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或“新文学史”课程，并编辑、出版了十多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如果把内部交流教材计算在内，就有几十部之多。这表明从事现代文学教学工作的同志对教材建设的重视，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教学及其编写工作，同样需要开创一个新局面。各行各业既然都有改革的任务，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研究与教材建设，也要进行改革。

我们面临的改革任务是繁重的。象如何提高现代文学的研究水平与教学质量，就是近年来共同关注并经常讨论的课题之一。但我以为首先要解决一个长期存在而又未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克服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工作中的“偏枯”现象。这个问题不解

决，所谓“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与讲授就会继续停滞在“缺胳膊少腿”的残废阶段，不能全面地正确地反映中国现代文学的真实成绩和整个面貌。

第一，要克服评述作家作品方面的“偏枯”现象。开国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一般是从“五四”前夕讲起的。最初一段时期，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着重讲述革命作家及其作品，为他们开辟专章、专节，而把其他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作家作品作为陪衬，少讲一些，把反动的作家作品撇开不讲，都是可以理解，未可厚非的。但时间一长，就显得这样的讲授、编写，远远不能反映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貌。何况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较后一段时期，就干脆只突出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与进步作家，明显的反动作家固然弃置不顾，就是一些非革命的或并不反革命的作家也被扔在一边。从而，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讲到的作家作品就十分有限、为数不多了。影响所及，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显得极其单薄，被人称为“现代革命文学史”。我们以为这并非讽刺。当然，果真称得上是完美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史》，也还是需要的。问题是仅仅有几个革命的和进步的作家作架子，在社团、流派、风格上看不出主流与逆流、革命与反动的相生相克、相互消长的历史轨迹，看不出革命作家是怎样团结非革命的作家、怎样与反动作家斗争、又怎样发展自己的历史过程。这就很难说是真正的文学史了。

革命文学是现代文学的主流，这是应该毫不动摇地肯定的。但是，革命文学并非天上掉的、地上冒的，而是在与不革命的、反革命的文学斗争中涌现、成长并发展壮大的。不讲清这些复杂、变化的关系和线索，就是名为“革命文学史”，也不能使读者了解“史”的发展过程。况且，文学史上的集团与流派是很复杂的，即使是基本倾向保守反动的文学社团与流派，其中也会有思想比较进步的作家，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他们往往会从中分化

出来。比如五四新文学的先驱刘半农，原来也属于“鸳鸯蝴蝶派”，但从“五四”文学革命一开始，他便“跳出鸳蝴派”，反戈一击，与旧文学很打了几次硬仗。又如张恨水，本是鸳鸯蝴蝶派的后起之秀，他写的《啼笑因缘》等小说风靡一时；但一到抗日战争的决战阶段——四十年代，他的世界观也开始变化，写出了比较进步的《八十一梦》等作品。开国后的某些“革命文学史”由于没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处理一些非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动的社团、流派、作家，就使本来丰富多彩、生气勃勃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成了只剩几条筋的干巴巴的枯燥乏味的所谓“革命文学史”。我们认为，只有真正地、全面地反映现代文学的流派、风格和作家作品，才能称得上是一部理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史》。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求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者对所有出现于“五四”前后到开国前夕的社团、流派、作家作品，不论革命与否、进步与否，来一次彻底的清理，认真的研究，坚决克服只讲革命的进步的作家作品，不讲或少讲其他作家作品的“偏枯”现象。

第二，要克服民族方面的“偏枯”现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汉族长期居于统治地位，有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兄弟民族业已汉化，有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兄弟民族长期没有自己的文字。前者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但除了极个别民族外，尚未编出自己的文学史；后者大多只有口头文学，即使整理了一些，也多未写入文学史。已有的文学史，对于兄弟民族的文学重视得不够，即使把个别少数民族作家开辟专节，也很少从他们所代表的民族着眼。至于一些口头文学作品，更是很少提到。因而，所谓“中国现代文学史”，实际上只是“现代汉族文学史”，并不能反映多民族的文学面貌。要克服这种“偏枯”现象，首先要动员兄弟民族作家自己动手，整理所属民族的文学作品，写出自己的文学史来。汉族作家也要协助少数民族的作家与文艺工作者整理、出版

口头文学，确定年代，作出评价。只有经过这样一番准备工作，充分提供兄弟民族文学的资料，才有可能克服民族方面的“偏枯”现象，写出真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第三，要克服地区方面的“偏枯”现象。现有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从取材看，都限于京（北京）、沪（上海）等大城市的文学活动与作家作品。许多边远地区的文学活动和作家作品，特别是港、台和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文学活动和作家作品，都付阙如，成了以京沪为主体的现代文学史。其实，“五四”以后，除京沪等地外，南京、天津、广州、武汉、长沙、成都、济南、西安、开封、太原、昆明以及东北等大城市都有文学活动和作家作品，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可能有人认为，京沪等大城市是全国作家荟萃之区，讲了京沪的文学活动，其他各城市的文学活动也就可以概见了。如果只是编写代表作家作品的讲评，这样的说法或做法是有道理的。但是，作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不能只是突出重点，还必须点面结合，把挖掘“点”的深度同探索“面”的广度结合起来。

第四，要克服时间方面的“偏枯”现象。中国现代文学一般从一九一七年胡适、陈独秀等讨论文学革命讲起，到一九四九年七月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为止。一九一七年以前归入近代文学，一九四九年后归入当代文学。这种划分阶段或时期的方法，沿用已久。但从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看，只从一九一七年讲起到一九四九年解决前夕止，毕竟不能反映现代文学的来龙去脉。胡适发动的文学革命是以提倡白话反对文言为主旨的，实际是清末白话文运动的继续，它并不是突如其来。早在清朝末年，学术界与文学界就开始了革新的运动，有的搞简字谱，搞注音字母；有的提倡白话文、新文体，倡导“诗界革命”。白话小说更是风起云涌。这些都是一九一七年文学革命的先河。胡适、陈独秀等正是继承了清末白话文运动的气势与成果，把它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成为新

文学运动的先驱代表。胡适等的功绩在使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发展为白话文学运动，使《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为封建士大夫所不齿的作品，上升为白话文学的正宗，将外国文学的文学样式新诗、话剧、小说……引进文坛。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作家，又把胡适、陈独秀倡导的文学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把侧重语言形式的改革的白话文学运动，发展为侧重思想革新的新文化运动（包括新文学运动）。我个人的这种看法只是说明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前后兴起，不是突如其来，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应讲清楚它的历史继承与发展趋势。同样的情况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交接与起讫关系。目前的情况是以一九四九年七月第一次文代大会或者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划线，用一刀切的办法，似乎现代文学的发展跟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宣布结束，另外进入一个“当代文学阶段”。几十年的事实表明，这种以政治事件划线的办法是违背文学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的。无论从作家队伍或创作实践看，“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决不会因为十月一日的国庆而发生本质的变化。究竟要不要从现代文学分出当代文学，似乎应就文艺的特殊规律进行一次讨论，借以使文学史的分期放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

第五，要克服文学本身的“偏枯”现象。凡是文学的历史，不仅要讲文学创作的发生与发展，也要讲文艺理论的形成与建设；不仅要讲文人文学，也要讲民间文学。但是，几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却很少讲各个时期的文艺理论对文艺运动和创作实践所起的推动、指导作用，也很少讲各个时期的民间文学的发掘、整理以及它们与文人创作的关系。这个事实，不仅使得现代文学的内容，长期以来偏重在对文人创作的论述，也使得现代文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长期以来得不到积累与整理。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有诗歌理论、小说理论、戏剧理论。如果

加以整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当代开展的某些文艺理论和文艺形式的讨论，如现代派文学、象征派诗歌（包括朦胧诗）问题，早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就已开始讨论，由于文学史家没有整理和讲述，使得一些陈旧的老问题似乎成了刚刚崛起的新问题，这就看不出文艺理论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使得人们经常走老路、走弯路而不自觉。又如民族形式问题，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都曾经讨论过。由于我们重在作家作品的讲述，忽视了民间文学的发掘、整理与讲授，使得文艺大众化问题，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都没有联系民间文学的实际，老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在新的口号或称号之下，重复过去的讨论，走了不少弯路。现代文学本身的这种“偏枯”现象，已经造成了不良后果，是应该引起注意的时候了。

一九八三年二月于江苏南京

关于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设想

陈 学 超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目前被称为中国近代文学。众所周知，这八十年的文学乃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最薄弱的一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诸种政治历史原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本身未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科学的研究体系。简单地把近代文学纳入古典文学的范畴，仅仅作为清代文学的一部分开展教学和研究，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局限和障碍。

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各个时期都有它的继承性和连续性。然而，历史上的文学现象并不仅是前因后果的联系，还有一

种对抗的联系，这就是在继承基础上的突破和革命。中国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新旧递嬗，无论内容和形式都突出地显示出它和传统文学的对抗，从而表明了这个新的时代——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文学与古代文学迥然不同的质的规定性。

悠久绵长、丰富多彩的我国古代文学，主要是我国两千年封闭的封建社会的产物。中国古代文学史以封建王朝的更替为分期标志，主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学发生、发展的全部过程和固有规律，阐述各个朝代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文学流派和文学创作的兴衰流变。这主要是封建意识形态下的文学现象。而当历史发展到十九世纪中叶，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华古国禁锢的大门，世界潮流涌进这块沉睡的大地之后，中国固有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解体了。随之，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阶级、新的阶层、新的人物，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的发展，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反映对象和作家队伍。这个变化，对于古典文学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质的变化。再从文学的内部规律来看，晚清以来，传统的诗文已成强弩之末，日趋衰败，许多诗文流派翻来复去，只是在形式上互相模拟，概无创造可言；正统的传奇、杂剧已堕落为陈腐的宫廷艺术，重曲轻戏、死抠声律的倾向窒息着戏剧的发展。文学要自由地、真实地表现日益变化的现实生活，必须开拓新的天地。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散文“文体革命”、“戏剧改良”等一系列文学改革；出现了大量切中时弊的谴责小说、宣传小说以及翻译小说；出现了“我手写我口”的新诗文。从此，中国文学开始与社会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开始与五彩斑斓的世界各民族文学相融合，开始与传统文学相决裂，提出建立民主主义新文学的一系列根本任务，从而开始向五四文学革命的高潮过渡。中国文学史上的这一进展，绝非以往古代文学中一般的进化和演变，而是在对两千年传统文学的否定

和斗争中，开创的中国文学的新纪元。无论近代文学还呈现着怎样的弱点和不足，这些根本的突破也必须从根本上去认识。

从目前的研究格局看，对近代文学这种划时期的意义认识尚很不充分。似乎只有五四新文学才是划时期的里程碑，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简直可以与古代封建文学混同，或者忽略掉。把近代文学的教学、研究任务交给古典文学研究者更是勉为其难。以大学中文系分工为例，近代文学的教学科研任务都由古典文学教研室来承担，这八十年的文学在两千年的文学史中几乎淹没了。加之大部分教明清文学的同志兴趣并不在这里，因而这部分文学史都是最后匆匆地捎带一下，甚至简略到连《中国文学史》读本中涉及这部分的内容都不能一一讲述，科研就很少谈得上了。而现代文学教学和科研任务又严格以“五四”为上限，这样就形成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这段“两不管”的荒地。要改变这种落后状态，必须尽快开辟近代文学的学术领域，组织一支有力的近代文学研究队伍，建立起一个科学的近代文学格局。

早在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同志就强调指出：“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818 页、823 页）四十年过去了，作为百年文化史重要组成部分的百年文学史的研究情况如何呢？“五四”以后三十年的文学史已经是大学中文系一门单独的必修课程，并且成为文学史研究中比较活跃的一个学科。在全国已经有一支近四千人的专业教学研究队伍，每年有上千篇专业论文和多种专著、资料、工具书出版。比较之下，“五四”以前这八十年文学史的研究却十分冷落。现在几乎还可以用

毛泽东同志四十年前所说的“无组织的状态”、“真正懂得的很少”来概括。极左思潮加于历史上资产阶级进步文学的致命刀伤，至今仍在流血！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这种“腰疼病”，已经直接影响着“五四”新文学的研究，也影响着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全面认识。

由此，我设想，将鸦片战争以后八十年的文学史和“五四”以后三十年的文学史结合起来，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通过这个新的研究格局，开辟学术领域，组织研究队伍，以推动文学史研究的深入进展。我的理由是：

一、从社会性质看，鸦片战争以后的八十年与“五四”以后的三十年同处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共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基础对于文学有着决定的作用，社会性质应当是文学史分期的最主要的依据之一（在史学界，近年来胡绳同志提出将鸦片战争到一九四九年这段历史统称为中国近代史，改变过去以“五四”运动为近、现代史分界的传统说法，已经得到公认）。

二、从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看，鸦片战争到一九四九年这段文学的主流，都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内容，以使用白话、描写现实、模拟外域、注重小说等为追求形式，以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为理论主导。

三、从新文学的发生过程看，“五四”文学革命所提出的主要口号和任务，几乎都是在近代八十年的母腹中孕育、诞生的。只有对新的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的要素逐渐消亡的过程，对那些口号、任务酝酿探索的曲折里程有一个明晰的了解，才能够更深入地认识五四文学革命的伟大意义。是八十年文学改良的风云聚汇，才形成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洪波巨浪。如果以“五四”为界，把这一百一十年的文学运动作为一场文学革命的两个阶段，似乎更确当一些。

四、从目前现代文学和近代文学的研究现状看，一刀切地以